◎文学新地理⑩

广东文学：文化融合新图景

□ 谢有顺

●没有人有权利蔑视“今天”，真正有价值的写作，无论是取何种题材，都必须有当代意识，必须思考“现在”

●广东作家对新移民人群以及他们生活的描写，是中国文学中全新的经验和表述

●广东的诗人较少那些不着边际的幻想，他们更崇尚脚踏实地

这几十年，中国在发生巨变，广东更是如此。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语言镜像，必然会体现出一个时代新的风习和气象；如何审视、书写当代人的生活与处境，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使命。但在今天的文学研究谱系里，当下经验因为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洗，于是成了最为芜杂、过剩甚至不值钱的经验——小说、影视界重历史题材甚于现实题材，学术界也重古典甚于当代。

派、文学论争，比如朦胧诗、伤痕文学、寻根文学、先锋小说、文化大散文等等，都非发端于广东，也无特别重要的代表性作家出自广东，所以这几十年来，广东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参与者，但不是引领者。其文学品格很难一言以蔽之。

但广东文学这几十年来依然有重要的贡献，那就是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大融合的图景。各个地方、各种风格的

但我想强调，没有人有权利蔑视“今天”，真正有价值的写作，无论是取何种题材，都必须有当代意识，必须思考“现在”。持守这个立场，就是一个作家的担当。波德莱尔说，“现代性就是过渡、短暂、偶然，就是艺术的一半，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”，而当代生活恰恰充满了全新的瞬间、全新的美，没有瞬间也就没有永恒。

一个对“今天”没有态度的作家，很难赢得世人的尊重；而如何才能处理好如此迫近、芜杂的当代经验，更可见出一个作家的能力。福柯说：“或许，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现时代的问题，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。”文学也是如此。不少人都说，今日的文学略显苍老，其实就是少了一点少年意识、青年意识。“五四”前后几代人之所以精神勃发，就在于当时的“文学革命”旗手们，内心都充满着对青春中国的召唤，他们当年反复思考的正是今天的我们是什么、中国是什么的问题。这种青年精神改写了中国的现状，也重塑了中国文学的面貌。

而广东文学这些年的成就和特色，最显著的就是一批青年作家的兴起，他们的写作，昭示出了一个青春中国的新质和前景。

回想起来，广东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各个节点，都有自己的声音，但这个声音并不显著，少有领一时之风骚或提出时代命题的时候。各大文学流

写作者都涌向广东，都在这块热土上生活、写作，并融入其中，从而写出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。南方的、北方的，传统的、先锋的，历史的、现实的，汇聚于一炉，色彩绚烂。这种文化融合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创新，从而使风格混杂本身也成为一种风格，无流派也成为一种流派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广东作家对新移民人群以及他们生活的描写，对改革开放和工业化时代下打工者故事的讲述，是中国文学中全新的经验和表述。广东有大量的新移民，他们从外地来此生活、工作，那么多的城中村，住着那么多的打工者——尚未站稳脚跟，生活动荡不安而又充满干劲，这些人是最有故事、最有活力的一群。从他们身上，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成功与重压，快乐与悲伤。你可以说他们是“边缘人”，是弱势群体，但他们也是转型期中国前进的主要力量。通过他们，可以发掘出许多新的文学经验。比如《闯广东》《黄麻岭》《女工记》《国家订单》《下落不明的生活》《工厂女孩》等作品，就有意记录这种现实，他们的写作，是生活在广东的打工移民群体最好的精神传记。

这些新移民人群所面临的苦恼、压力、困惑、悲伤，以及他们的快乐和希冀，是现代生存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以前我们只要一讲到岭南，就想到民俗、美食、西关美女、柔软的日常生活

图景，等等，太单一了；现在的岭南呢，发生了变化，原有的还保留着，但新的各种现代症候也正在被真实地面对。

这些新的生活形态，是文学表现的新对象。这些年轻的作家，带着从各地来的口音和记忆，在生活和文化的多重激荡中，通过自己的书写呈现当下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问题，借助文学完成新的城市文化身份的建构，进而表现出工业时代里每个人不同的精神气质。你总能从广东青年作家的作品背后看到一道影子——它来自不同人的不同记忆，也来自不同文化和族群，而正是这种杂陈和混合，使得广东的文学并不单一，它看起来是当下的，其实也是历史的，看起来是现代的，其实也隐藏着传统中国的面影。它的宽阔、丰富和无法归类所蕴含的活力、前景，正使广东文学变成一个当代文化研究的生动标本，个中所呈现的经验、人物和各种精神面相，是之前的文学叙事中所未见，也是别的省份所没有的。

这一点，在广东的诗歌写作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。广东活跃着大量的诗歌写作者，也有很多有影响力的诗歌活动——杨克主编的《中国诗歌年鉴》、黄礼孩主编的《诗歌与人》、莱耳创办的“诗生活”网站，在诗歌界都成了重要的符号。有人说，广东这地方务实、世俗，缺乏诗意，也产生不了好的诗歌，这显然是文化偏见。诗意并非是空洞、飘渺的，它就隐藏在日常生活里，在一些平凡人的心里。诗歌并非只与天空、云朵、隐士、未来有关，它同样关乎我们脚下这块大地，以及这块大地上那些粗砺的面孔。广东的诗人较少那些不着边际的幻想，他们更崇尚脚踏实地的写作、表达、生活。这样一种诗歌气质，也有效重建了诗歌与日常生活的关系。诗歌不完全是朝向远方的，也可能是向下的、此时的，是既可以关怀生活日用，也可以寄托精神的艺术。

此外，广东有大量的网络文学作家，网络文学的作品数和读者数，据说也一直居全国首位。最具影响力的那批网络作家，多数是在广东起步的，他们的许多代表性作品，也都在广东写就。广东还创办了“广东网络文学院”、《网络文学评论》杂志，均是国内首创。

网络文学对写作空间的开创尤其值得重视。文学空间开创一直是文学革命的主题。比如说意识流小说对时间的处理，包括多种叙事角度并行，本身也是对空间的一种拓展。传统意义上的地方性写作，会有一个情感倾向，故乡就是家园，这是一种比较恒定的文学情感。但是在新的文学空间里，比如说在广州和深圳这种移民城市，有很多异乡人汇聚在一起，会对空间产生更复杂的反应。过去讲到写作，强调地方性，强调具体的生活空间，但是在当下，出现了没有故乡、地方性、现实感的写作，这已成为非常普遍的写作现象。大量的网络文学，是没有地方性的。不强调故乡，不重视地方风俗、地方体验的描写，甚至没有具体现实所指。这种新空间的开创，正在产生新的文学写作类型。

网络空间的开创，使得写作不与具体的地方、故乡发生关系，以致这些年文学领域出现了很多新现象和新问题，它们改写甚至颠覆了我们的文学观念。如何面对与阐释它们，正在成为一个新问题、大问题，而广东的网络文学写作与研究，是其中至为重要的实践和样本。

或许，比之广东这片土地上这么丰富而复杂的经验，广东作家远没有写出真正大气、厚重的作品与之相配，因为任何新的经验都需要长时间地去咀嚼和消化，任何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建立，也许要凝聚好几代人的努力。但在一个新的“文学岭南”的建构过程中，新移民的故事、日常生活的诗意、网络文学的观念变革这3个方面，为中国文学的发展，为确认“今天”的我们是什么、中国是什么提供了全新的艺术经验。

（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）

◎新作评介

成长的路径

——评李凤群《大野》

□ 戴瑶琴

李凤群的小说不以故事性见长，她的叙事节奏很慢，不制造大起大落与大悲大喜，作品的感伤质素会伴随读者思考的深入程度，显现弥漫出来。与《大风》大跨度的家族叙事相比，新作《大野》更加聚焦，作家通过人物心理的不断取舍以追随社会的各种浮动，而并非强化或者营造种种人物命运与历史事件的汇合，从这一点看，它跳脱开了常见的叙事套路。

“70”后女性的成长是《大野》所关注的核心话题，在桃出生于1978年，作品一方面表达着写作主体与写作对象的相似情感体验，另一方面呈现出“70后”一代在改革开放40年过程中的共同经历，而解开小说的密钥是“比较”与“依存”。

《大野》定位于关怀普通家庭的农村少女，跟踪她们屡次“从一种生活走向另一种生活”的经历。这是一种在不断的追索与压抑里踩踏出的不同发展路径，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的互相迁就、互相撕扯、互相压制。大众化的故事和人物构思，排除了极端情境和特殊人群，以朴素的人物呼应读者的期待。

今宝和在桃互为镜像，如同中国建筑的卯榫结构，没有施加戏剧性描写的外力或重力，却将故事与人物严丝合缝地聚合在一起。在桃选择的路向是出走，我大胆地猜测这个名字是与“在逃”谐音，李凤群有意识地赋予她特殊使命，一切离经叛道的行为都被用以肯定自己的选择。“我就确定了什么叫不爱，可是我还是一直在找爱，就像一堵墙，你站在墙的反面，你更想看到它的正面。”那么，在桃如何找到爱？她发现的有效途径是通过痛，“痛苦！不管这个痛苦大不大，这终究是痛苦。这痛苦就是粘合剂，贴紧了我和他。”在桃和南之翔的情感际遇，诠释了爱与痛的互相转化。因为痛（温饱）渴望爱（尊重），因为痛（尊重）追求爱（爱情），因为爱（爱情）再次产生痛（尊严）。

今宝选择的路向是留下，为了照顾每位家人的感受，必须藏起并压抑自我，混沌度日。“最糟糕的生活就是这样缓慢的无声的耗损。”这与“70后”作家张惠雯界定的“现代病”是同质的，它是“无法治愈的、现代的烦闷，那种挥之不去也无所寄托的欠缺与失落。”今宝渴望被尊重（家庭与社会）、被爱（丈夫），但父亲临终的叮嘱“替我照顾好弟弟们”又时时刻刻提醒她将一切个人规划偃旗息鼓。“她突然对着镜子发出一连串的诘问：你是谁，这是哪里，这是在干什么？一惊之下，她猛地咳了一声。声音消失了。因为，她凭着自己的声音，感到自己心如死灰般的绝望。”在对比的视阈下，温饱、安全、爱、尊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其实是小说人物设计的一个重要基点。

小说耐心地刻画共同的成长诉求：在桃和今宝各自需要对方的生活。两人之间的通信，搭建起一条密道，构成了生命意义的互动。在桃和今宝展示着闯荡社会与相夫教子两种相反的生活模式，而其中却交织着激进与保守两股相同力道的成长冲动，互为“他者”的多义性被阐发。互相检视、体认与思考后，她们发现最通达的方案是回归，化繁为简，先前由个体构筑的理想自我的幻境被完全戳破。

《大野》呈现的是生于20世纪70年代农村女孩的自我“成长”，其动因是“你更向往自由，你渴望经历一些故事，遇到爱你的人，看重你的人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也看看别人怎么活。”李凤群对它的价值进行了分析，给出了结论：人都会在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的反复过程中，理解自己、宽宥他人。在桃最终甘于平凡，享受安定，她不断“逃”的动因是“爱”，为了年少的那场“青春梦”，但重遇南之翔后的生活，是她主动推翻了以前一切的“自我肯定”，而选择无尊严地画地为牢。她对“家”的回归，实际又否定了她卑微的爱。今宝在循规蹈矩中抵抗顺从，从起先对婆婆权威的挑战，到一次任性出走，最为极端的是以跑步的方法与孕期较量，我们从中可以梳理出今宝在被规训中不断制造出“否定”的拐点。当遭遇丈夫破产、弟弟背叛，今宝对杏红说：“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，早上起来就知道一天要做些什么，要发生的事全在脑子里，一桩桩，心里有底……我是真的觉得忍耐比自由更重要，因为忍耐向内，要是自己不折磨自己，旁人也折磨不了。”成长中否定和肯定的攻守，是成长的过程与代价。

《大野》与《大风》分别围绕“成长”与“寻找”的不同母题，但它们却殊途同归到“爱”这一点上。埋设在两个女孩之间的感情伏线并非欲望、梦想、自由等宏大主题，而是相遇的那刻，在桃令今宝“闻到了一种特别的味道，这种味道不让人疼痛，却让人产生幻想，这个味道让人想起了远方，想起了爱，想起了忧伤，同时又想起了——家，我的眼泪快要掉下来了。”大风和大野，都昭示着释放、追寻和坚强。爱是《大风》里无形的风，在《大野》里依然指引着成长的方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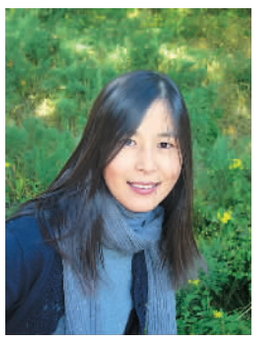
李凤群在创作谈中写道：“我总会看见形象和性格都迥异的姑娘并肩走在街上，如此不同，又如此合拍……时间流逝，我的青春随之消逝了，这些姑娘们也消失了。她们散落在人间的各个地方。我常常想起她们的面容，常常追问：经过这么纷繁的时代，她们的人生，有怎样的经过，后来又达到了哪里？”

台港暨海外“70后”华文作家，无论是写“中国故事”还是“他国故事”，会主动思索“70后”一代人的独特体验。周洁茹剖析“70后”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孤独，张惠雯揭示美国“70后”华人新移民的烦闷，李凤群反思改革开放中“70后”的成长路径。“我是否挽留住了记忆深处那些与我一同长大的少女们？她们有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？我是否拉扯着她们一起走得更加光明？”李凤群在《暗自欢喜胜过锣鼓喧天》里提出了三个问题，答案都是“我不知道”。我认为《大野》是她用文学在挽留与她一同长大的那些少女，但她们以后会怎么样？走一步看一步？这其实也正是写现时态生活的魅力。

◎作家谈

谅解并且热爱这世上的一切

□ 付秀莹



●女作家，也不止女作家，一生迷恋纸上世界，大约无非就是寻觅那个知己吧

●女性命运，大约从来都同其个人情感境遇有着缠绕不清的关联

最近，性别意识、女性写作、女性经验、女性主义等话题常常被提起、谈及。我也经常被读者问到，作为女作家，你觉得优势和难处是什么，你如何看待？老实说，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被称为女作家是一种冒犯，或者是评判标准的暗中降低，是男性中心话语阴影的遮蔽或者覆盖。我也不认为，女作家就一定没有作家那么响亮、正大、高级。女作家就是女性作家，不必过于敏感和纠结。

自然了，因为性别差异，到底是男女有别。女性好像更细腻、更柔软，心思幽微，一腔柔肠，千回百转。两个女人见面的问候，往往是，“你这裙子真好看”。这是女人之间的礼节，也不必当真。就像一个女人哭诉她先生的种种不是，最好的态度，大约是帮那可怜的先生说话。梁实秋在《论女人》中说，假如女人所捏造的故事都能抽取版税，便很容易致富。奥斯卡·王尔德也说过，艺术即是说谎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女人或许是天生的小说家。打着虚构的幌子，一本正经地说谎话，只不过，兜兜转转，她总有本事自圆其说。小说是什么呢，其实就是小声说说。这是汪曾祺先生的话。一个女子，她的生活或者圆满，或者有缺憾，她内心里总不免孤独。心有郁郁，无以遣之，遂一发而为笔墨。她本是自言自语，说给自己听的；倘若无意中被人家听到了，心有戚戚者，便是知音了。女作家，也不止女作家，一生迷恋纸上世界，大约无非就是寻觅那个知己吧。

多年来，我一直写故乡“芳村”，写乡土中国。“芳村”一直是我文学创作的精神根据地，长篇《陌上》更是“芳村”这一文学版图的集中呈现。以物理时间计，我的城市生活比乡村生活更长，与我耳鬓厮磨、日夜相对的其实不是“芳村”，是城市。作为小说家，我迟早要把我置身其中的城市写出来，即将出版的新长篇就是我积累多年之后的一次尝试。

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，书写一个女性的精神成长和命运遭际：从乡村到城市，从芳村到京城，那道射向精神的隐秘的微光，不断照耀，不断闪烁。内心世界的千回百转，情感生活的颠沛流离，心灵的动荡难安，人性的撕裂和挣扎，价值的颠覆和重建，精神的蜕变和新生，所有这一切，都成为深刻的痛楚的烙印，影响并重新塑造着人物的精神面目和心灵世界。人生困境中的不屈和不甘，对人性尊严的捍卫和珍惜，暗夜中的彷徨歧路，内心力量的生发、积累以及壮大，女主人公在生活的激流中沉浮辗转，在命运的壁垒面前跌跌撞撞，伤痕满怀，最终获得了内心的巨大安宁。

这部长篇书写城市，但我的芳村始终在远离城市的地方默默伫立，暗中相助。一个芳村女子对于城市的想象和期待，在现实的强大碾压之下，如何破碎，如何百般缝合而不得？千疮百孔之后，如何在生活的烈焰中艰难重生？如果把这部长篇视为“我”的自叙传，那么，这部小说大约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女性的个人史。个人的，私密的，暧昧、复杂、丰富、幽深，一言难尽，有着强烈的女性色彩和个性气质。

女性命运，大约从来都同其个人情感境遇有着缠绕不清的关联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女性的情感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女性命运的走向。小说以人物情感为脉络，跨越近40年，书写了一个女性从少年、青年到中年的成长历程，从天真稚嫩到饱经沧桑，再到纯净如水；从内心动荡到内心安宁；从单纯到复杂，再到重归单纯。城乡文化的碰撞交锋，异乡人的新乡愁，残酷的城市生存法则，北京新移民的中国故事……小说以巨大的叙事耐心，仔细勾勒出一代人的精神地形图，写出了社会转型期新的中国经验。小说在现实和回忆之间自由往返，有时间的纵深感和苍茫的命运感。看似日常的叙事背后，有大的时代背景若隐若现。个人命运和时代生活之间的关系缠绕纠结，有一些意味深长的东西在里面。

在结构形式上，小说的主体部分之外，还插入了七个短篇小说。插入部分和主体不断对话、对峙、反驳或者争辩，构成一种巨大的内在张力，从而有一种多声部的叙事效果。现实和回忆不断交错、闪回、缠绕，叙述上更自由更从容。

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且把他乡作故乡。这部新长篇里的疼痛、创伤、苍凉、孤寂，最终都获得了抚慰和安放。理解和体恤这世上人心的苦难，谅解并且热爱这世上的一切，这是地母般的辽阔、温厚、包容和悲悯。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